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BY
CHARLES A. KUPCHAN

美国时代的终结

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

[美] 查尔斯·库普乾
著
潘忠岐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美)库普乾(Kupchan,C.A.)著;潘忠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ISBN 7-208-05080-5

Ⅰ.美… Ⅱ.①库…②潘… Ⅲ.外交政策—研究—美国 Ⅳ.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0068号

责任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东方编译所译丛·
美国时代的终结
——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
[美]查尔斯·库普乾 著
潘忠岐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插页4 字数352,000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08-05080-5/D·885
定价28.00元

序

王缉思

本书作者查尔斯·库普乾教授和译者潘忠岐博士，嘱我为《美国时代的终结》中文版写一篇前言。其实，作者在2003年英文版的前言里，已经清楚地交待了本书的政策含义，潘博士的译序又对全书作了详尽而精彩的评介。再就书论书，不免狗尾续貂。我仅想写几句“题外的话”，为译序做点小小的补充。

不同社会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有不同的生活追求。在号称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里，国情国力各异，各国战略目标的差别极大。“大战略”是大国的奢侈品，尼泊尔这样的国家是不会讨论大战略的。同样是大国，日本（就其经济实力和人口来说应属大国之列）在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在美国的大伞下乘凉，很少听日本人提起本国的大战略。俄罗斯虽然脱胎于大战略曾经明确的苏联，但其国内经济政治制度还很年轻，形成大战略即使不是为时过早，也是力不从心。被库普乾看好的欧洲联盟，在形成统一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还处于幼年时期，只能借助于德国、英国、法国等强国的国家战略的合力，来寻找未来欧盟大战略的方向。印度是大国，但还不是公认的强国。印度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它对巴基斯坦等邻

国的心态，都表明它还没有具备构建一个放眼全球的大战略的需要和能力。

所以，现在对讨论大战略最感兴趣的，除了美国人以外，大概就要数中国人了。何谓大战略？库普乾的定义是："大战略是要确认地缘政治分裂带，弄清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哪里和将以何种方式会相互产生矛盾，显示将可能最终引发主要战争的裂隙。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确定这些分裂带在哪里，而且还在于厘清如何战胜它们——或者至少厘清如何减弱它们的毁灭性潜能。"换成通俗的中国式语言来说，大战略就是了解全球政治格局和力量分配，找到主要矛盾与战争的来源，并且提出战胜潜在对手和减轻战争威胁的行动方案。

近年来中国的有关政策研究机构和学者已经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国际战略研究报告和学术著述，其中既有对美国等国家大战略的评述，又有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设想和建议。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战略思维越来越重视。在探索中国大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库普乾等学者的思想深度、广度、逻辑性、历史感、现实感和各个学科的相互交叉方面，借鉴不少有益的东西。

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分析大战略的概念，到评述美国学者提出的大战略的各种不同思路，再到探讨美国大战略的国内政治背景和制约，最后提出作者本人的一套战略思维体系和建议，行文流畅，一气呵成。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仅关心库普乾写了什么，还关心他没有写什么。换句话说，假设我们要构筑中国的大战略思路，有什么是我们必须确定而库普乾无须考虑的逻辑前提？

首先，库普乾提出的大战略没有涉及美国的国内政治稳定问题。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在使用"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的概念时，主要还是指来自外部世界的安全威胁。虽然“9·11”之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对外部世界的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组织渗入美国社会十分警惕，但美国人仍然没有对他们政治制度的牢固性产生疑虑。库普乾只是提到，在数字时代，美国要形成一个新的大战略，需要有“反应灵活的政治制度”，更多的公众政治参与，凝聚一种更强的国家身份(identity)。但是，中国的大战略首先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国内政治稳定，防止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同美国的 national security 有相当大的区别，前者包含着政权稳定、政治安全的含义，正像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翻译为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所显示的那样。

其次，库普乾提出的大战略也没有明确地提到美国如何坚持其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反复强调的“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美国民主党人长期坚守的一些思想原则。美国要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球，是不言自明、无须重申的事情。同时，美国人在对外战略上尽管有许多争论和流派，但主要分歧是政策、策略和手段上的，而不是价值观上的。美国在国外追求的意识形态目标同它国内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同它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也是一致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战略就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必须讲明中国不欲将国内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广到国外，但又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一个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也是库普乾等美国学者反复思考而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库普乾在本书中评论道：“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不可能预测它的意图将会如何变化，以及它同美国的关系是走盎格鲁—美利坚关系缓和的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性道路，还是走盎格鲁—日耳曼对抗和战争的恶性轨迹。因此，美国还没有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决定它应该为中国的雄心留出空间，还是果断地寻求封锁它的发展道路。对于华盛顿来说，以对欧洲让步的方式通融中国，将是天真的，北京的意图很可能需要制约。但是，认为中国已经是对手需要进行严厉遏制的假定，也是一样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美国能够承受对中国采取等待和观望态度吗？尽管悲观主义者发出了最响亮的警告，但是中国并不具有成为美国主要竞争者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库普乾对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观察，在美国政界是有代表性的，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想，即在同中国交往中既合作又制约，继续观望，“两面下注”。因为中国在美国大战略里的地位同美国在中国大战略里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所以两国相互战略定位里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中国人发展自己的大战略思路构成了更大的挑战。

第三，库普乾的大战略思路里，基本上不包括美国自身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中国的大战略就必须明确地将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经济发展战略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里说到发展是第一要务，说到“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还说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协调关系，决定了中国大战略的出发点和逻辑前提。

除此之外，库普乾当然无须考虑美国的国土统一问题，而中国的大战略必须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因此，我认为尽管中国学者能从美国人的大战略研究中受

到启发，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领域”(issue areas)、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国家战略目标，从形式到内容都跟美国十分不同。我也一直认为，在没有对上述若干有中国特色的问题研究透彻之前，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时机尚未成熟。

当然，对中国国际战略的研究来说，还有一个决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的问题。库普乾说：“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大战略的讨论极少，但是某些外界思想家却做得很好。在为数不多的仍对思考大战略问题感兴趣的分析家中，一个相对生动活泼的辩论已经慢慢形成。”库普乾和本书中提到的“某些外界思想家”，如弗朗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托马斯·弗里德曼、约翰·米尔斯海默、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卡普兰等人，大都曾有过从政经历，或同政府关系密切，所以在政府内外有关美国大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辩论形成了一个网络，一种互动。在中国，过去学者和政府官员缺乏沟通的情况正在逐渐改变，出版界和媒体也比过去更为开放地探讨战略问题。在这种有利环境下，本书的出版应能对中国的大战略研究起一点小小的推动作用。

2004年立夏于北京

译序：另一种形式的罗马回归

潘忠岐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都达到了史无前例、无可匹敌的程度。“9·11”事件也未能削弱美国的实力，反而使其全球霸主地位更加稳固。[1] 因此，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已经由“单极时刻”进入“单极时代”，[2] 美国霸权造就的单极世界不仅无法撼动[3]，而且美国时代正在回归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4]

然而，与传统思维相反，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在新著《美国时代的终结》[5] 中指出，冷战丧钟宣告的并非美国的最终胜利，而是其全球主导地位走向衰亡的开始。“9·11”事件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诉求，并由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精神分裂式的结合取而代之。欧洲崛起使美欧之间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对抗，大西洋联盟的解体就像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一样正在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时代不是正在回归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而是正在回归衰落时期的罗马分裂。

一、大战略的缺失

一个强国能否塑造并维持一个以自身实力和意图为主导的时代，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否拥有超强实力，而且更在于它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准确而清晰的理念地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平衡手段与目标的大战略。库普乾明确指出："罗马帝国、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些时代并不仅仅是罗马、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力量造就的，而且也是他们为管理和维持各自优越地位而设计的、极富创造性的、远见卓识的大战略成就的。"[6]

正是因为一个恰当的大战略对于一个大国的康宁和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库普乾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要想保卫自己，捍卫它通过艰苦努力建构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可靠有效的大战略。"[7] 美国享有压倒性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主导地位。"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拥有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强大的能力来塑造国际政治的未来。"[8]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却缺少维持美国时代长治久安的另外一个关键要素，即大战略。也正是因为大战略的缺失，美国时代的终结才变得难以避免。

冷战结束带来的地缘政治空间虽然为美国创建新的世界秩序、提出新的大战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美国却荒废了这个历史时刻。在库普乾看来，从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11"事件，"美国没有大战略，没有指导国家之船正确航向的设计方案"[9]。尽管自"9·11"以来，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大战略——"以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原则为基础的大战略"，但是，它却是一个错误的大战略，"它的主要成功之处只在于疏远了大部分世

界，破坏了美国的关键伙伴关系”。[10]

冷战结束十多年来，美国之所以陷入战略盲目，与冷战不期而终有关。但是，库普乾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准确的理念性世界地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成了一个茫然失措的大国”。作为全球秩序的维持者和国际体系的终极卫士，美国不仅看不到真正挑战者的崛起，而且逐渐丧失了对国际参与的兴趣。似乎美国政界没有对大战略的迫切需求，学界也没有关于大战略的有效供给。虽然为数不多的对思考大战略问题感兴趣的人的确提出了一些理念性世界地图，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库普乾写道：“要提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大战略，就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世界地图。地图上事关紧要的不是地理特征——海洋、高山、河流，或者甚至国家疆界。相反，大战略是要确认地缘政治分裂带，弄清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哪里和将以何种方式会相互产生矛盾，显示将可能最终引发主要战争的裂隙。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确定这些分裂带在哪里，而且还在于厘清如何战胜它们——或者至少厘清如何减弱它们的毁灭性潜能。”[11]由此出发，库普乾对现有的五种地图范式一一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版本。

在库普乾看来，弗朗西斯·福山、约翰·米尔斯海默、塞缪尔·亨廷顿、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卡普兰、托马斯·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关于21世纪美国世界地图的竞争性洞见。每一种洞察都有自己的长处，但它们全部都是错误的。而且它们大部分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错误，即错误地界定了新的地缘政治分裂带。这五种地图分别认为主要分裂带将出现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12]，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13]，世界主要文明之间[14]，繁荣的北方与动荡的南方之间[15]，遵守全球化数字经济之规则的

国家与对抗这些规则的国家之间。[16]但是，库普乾认为，诸如此类的归纳全部都是错误的，因为今日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地缘政治分裂带。

根据库普乾的世界地图，“全球体系的惟一界定因素是实力的分配，不是民主、文化、全球化或者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权力之极的世界。而且，它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此时此刻，根本的、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特征是美国的主导优势地位。”“如果地缘政治分裂带出现在权力之极之间，而今天只有一个这样的极，那么结论就是，分裂带并不存在。美国是拳击场上惟一的竞争者。它因对手缺席不战而胜。”[17]

由此，库普乾对“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提出的“以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原则为基础的大战略”进行了批评。“9·11”恐怖袭击是这个大战略的主要理念依托，但是，库普乾认为，恐怖袭击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内在结构，不论恐怖主义对世界惟一超级大国进行了何等程度的痛击，它都无法改变全球体系的单极性质，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与反恐怖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构不成界定未来国际体系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因此，美国现政府的大战略是建立在错误的理念地图基础之上的，它过分夸大了恐怖威胁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力，“通过把反恐斗争确认为指导性优先议程，并出台新的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的原则，华盛顿采纳的是一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反对的大战略，并因而损伤了继续作为国际和平与繁荣基石存在的伙伴关系和国际制度。”[18]

美国在无功徒劳。因为“美国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也肯定不晓得如何达到那里。如果没有一套指导性原则，即大战略，那么即使善意的努力也将无所作为”[19]。虽然现在“美国时代存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着，而且健在着”，但是理念地图的不当和大战略的缺失却在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替代权力中心的崛起、美国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的上升，将共同使美国的单极时刻成为昙花一现。

二、欧洲崛起与罗马再现

欧洲走向统合并作为一支新的地缘政治力量崛起是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最大一次变貌。同样重要、几乎同时发生的另外一次变貌，即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只是更加凸显了这次变貌的历史意义。虽然很多人并不看好欧洲崛起为新的权力中心的能力，或者并不认为崛起后的欧洲会生发出与美国抗衡的战略意图，但是库普乾反驳了这种流行思维，认为今天的欧洲统合将像过去的德国统一一样，不仅能够集聚作为替代权力中心所需的实力，而且一定会在此基础上滋生新的地缘政治野心。欧洲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西方世界的一分为二，并像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从而导致罗马时代迅速衰退那样，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

1871年，俾斯麦将中欧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彼此独立的大部分讲德语的土地统一为一个单一国家。之后，新德国获得了几十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并很快带来了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的稳步提升。正像当时即将成为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所担心的[20]，德国人联合成一个单一国家无法挽回地打破了欧洲均势，永久性地破坏了英国大战略的基础，并使其全球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库普乾对今日欧洲统合与过去德国统一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历史类比。虽然与俾斯麦德国不同，欧盟还没有成为，而且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但是，欧盟的总体实力必须以各个国家

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力量相加来进行评估。欧盟的年生产总值将近8万亿美元，相比而言，美国大约为10万亿美元。随着新一轮扩大的完成，欧盟的集体财富可能不久就会与美国持平。欧元作为世界上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很快就会对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构成威胁。虽然欧盟并没有在军事实力和防御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并因而给人留下了“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印象，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观。德国的统一也是贸易先行，但是政治联盟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很快就随之而来了。美国的统一也是一样，军事和政治统合远远落后于经济统合。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美国也只是潜在的经济巨人，而不是主要的战略存在。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美国的统一彻底改变了北美的地缘政治，并很快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政治。因此，库普乾坚信，欧盟一定会步德国和美国的后尘，它不仅会生发出对外野心，而且注定“在新的地缘政治世界地图上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实体”[21]。

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库普乾预言，欧洲崛起会像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一样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并从而导致西方世界的终结。为了有效管理过于庞大的帝国疆域，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将帝国一分为二。起初，戴克里先的改革方案在加强帝国安全、使帝国东西部分有效消除外来威胁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最终，这项出于善意的政策却因为将权威中心一分为二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单极维持的和平很快便让位于两个权力中心之间为争夺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对抗。

库普乾认为，今日世界美欧之间的分裂和对垒似乎正在重蹈罗马帝国分裂并衰亡的历史覆辙。因伊拉克危机而彰显的美欧分歧，一时间成了政界和学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对于美欧分裂的根源和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前景，各种分析见仁见智。[22]

库普乾是最早意识到这种分裂的学者之一[23]，与罗伯特·卡根批评欧洲的软弱不同，库普乾认为欧洲将是美国未来要面对的真正强大的对手，他虽然并不确定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是否将步罗马和拜占庭的后尘，走向地缘政治对抗，但是，他认为这方面的警示已经明确出现了。美欧之间暂时的竞争很有可能发展成为更严重的对抗。

尽管有人提出，共同历史和价值观会有效维持大西洋联盟纽带的韧性，欧盟和美国不可能分道扬镳[24]，但是，库普乾认为，同样的共同历史和价值观并没有能够阻止东西罗马走向对抗与分裂。而且，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在价值观方面也出现了彼此竞争的态势。“美国人认为欧盟对多边主义制度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承诺太过天真、自以为是，是军事软弱的结果；欧洲人则认为美国对使用武力的依赖太过简单主义、自私自利，是实力过剩的产物。”[25]

这种价值观方面的分歧跟利益方面的分歧一道，不仅严重侵蚀着大西洋联盟关系，而且给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带来了严重打击。库普乾认为，美欧之间的有效协调是当前大多数多边主义国际制度能够达成共识和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保障。但是，当欧洲抵制而不是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时，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就会陷于瘫痪，难以正常运转。最明显的例证是，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英曾试图寻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但是由于法国事先扬言要动用否决权，因此他们只好作罢。美英联军绕过联合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行为，严重挑战和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当代西方世界与 4 世纪罗马帝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分裂是自发的，后者的分裂是自觉的，但是，结果都一样，分裂双

方最终都会走向对抗并加速各自时代的衰亡。虽然由于地理上的自然分割，美欧之间不大会像罗马与拜占庭之间那样不断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但是，欧洲崛起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欧洲将成为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新的权力中心，欧洲与美国之间会逐渐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取代因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消失的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分裂带，由美国和欧洲有效联合构成的单一一极——西方——很快就会再现罗马帝国式的分裂。由于自冷战以来，大西洋联盟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基石，因此随着"大西洋联盟的死亡"和"西方的终结"[26]，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回归多个权力中心之间的对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正在回归衰落时期而不是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面临的挑战既非来自伊斯兰世界，也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统合中的欧洲。

三、美国时代终结的国内逻辑

正如美国时代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美国时代的终结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诸多国内外因素中，欧洲崛起和美欧分裂只是导致美国时代终结、世界回归多极的外因，其内因则在于美国自身的国内政治、美国对于承担全球霸权负担的矛盾心态、美国公众对美国国际主义支持程度的下降等等。虽然很多人并不认为，美国会从全球舞台上后撤，政治精英和国内大众对多边参与的支持程度会锐减。尤其在"9·11"事件后，许多人预期，美国管理世界事务的兴趣会持续勃兴，华盛顿将继续乐于担当领导者的职责。[27]但是，库普乾并不认同这种流行思维，而是坚持认为："未来几年，美国的国际主义将迅速式微，并变得越来越单边主义。"[28]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同孤立主

义形成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致命组合，它们将一并促使美国时代走向终结。

通过回顾美国的发展历程，库普乾认为，三方面国内辩论对于塑造美国国际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大战略至关重要。它们分别是："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应当指导国策的制定；在形成大战略时，如何协调美国国内不同地区间相互竞争的文化与利益；如何管理政党政治，并限制其对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29]自建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就一直贯穿于美国大战略的制定；美国不同地区千差万别且变动不居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也对国家大战略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由于美国非集权化的权力制衡体制限制了对外政策的稳定推行，因此美国的大战略极易受到政党政治的左右。一战后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失败和二战后美国参加联合国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美国要制定行之有效的大战略，就必须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平衡美国各个地区之间的不同利益和文化，使外交战略摆脱党派冲突的羁绊。

过去，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主要是由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维持的，先是德国和日本，后是苏联。由于存在明确、紧迫的外部威胁，国内政治方面的制约因素难以发挥作用，这些制约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着美国的对外野心，并滋长着美国人对参与国际制度的反感。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期间形成的国内共识的解体，人们再也无法确信，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支持是否会持之以恒。因此，库普乾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影响美国国际主义和大战略的三方面辩论继续决定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基本生态，并再度成为制约美国国际参与的主导因素。

较年轻的、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期间决定性事件的美国人，现在正进入显要职位。经济相互依赖、信息革命

和国际恐怖主义可能使他们对孤立主义具有免疫力，但是，他们不会自动成为像年长美国人那样的国际主义者。美国南方和山区西部的人口与政治影响正在上升，这使支持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选民得到了加强，并潜移默化地导致了同沿海地区文化和政治差距的加大。建立跨地区和跨党派的国际主义联盟很可能变得更加困难。美国西班牙裔人口也在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由于西班牙裔美国人倾向于集中居住在像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这样的重要选举州，因此美国中部和南方有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更为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库普乾认为，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外交所日益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并不是一种暂时现象，而是一种必然趋势。国内政治生态的这些变化正在促使美国国际主义重新变得更不确定和更为匮乏。[30]

虽然有人认为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会抑制国内政治对美国国际主义和大战略的消极制约[31]，但是，库普乾不以为然。他认为，恐怖主义不会使美国排除孤立主义或者单边主义的诱惑。追求国家远离国外麻烦，是美国一直可以追溯到国父的传统，这个传统完全有可能被全球参与成本的提高重新唤醒。美国人对多边主义制度具有一种长期累积的反感，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多边制度损害单边倡议的自由。美国人一向对自己的国内制度都心存疑虑，让他们对国际制度集结热情、托付意愿那就更是难上加难。相应地，当美国的确有所作为时，它会完全我行我素——就像在伊拉克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因此，库普乾写道："长期内，恐怖主义可能会对美国国际主义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它肯定会加强在2001年9月之前就已经成为潮流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恐怖主义不会成为让美国回归中线的集体威胁，相反，恐怖主义可能会像一张通配符(wild card)一样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